

岫廬文庫

〇六三

王壽昌
陳永逢
主編

王 漪 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明清之際中學之西漸

卷之四

四庫全書

明倫彙編

卷之四

中華書局影印

王 漪 撰

明清之際中學之西漸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方

往來年六初度，政大政研所諸
君時集文為壽。新才人情年少，結
二不常期也。結不終友，想諸君子
人為一文外，知所以風雨聲，自初
加者不十人，歲日素雅之，不周角底

为本写照。今得而十餘文，彙刊之。
 集類曰：永和、弘治、正德、嘉靖、萬曆、
 天啟、崇禎、順治、康熙、乾隆、嘉慶、
 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民國、
 年九秩，所因心臆，愈弱之哉。而
 為羊為匹，所喘。廣游諸子，以文為
 前，惟稍厚。而前，為人，一文。

集卷之六 則人各一書 多為吾兄之
作 既屬學幼性 之以為佳 久遠者 亦
習心 亦常記 堅想 為人 而乾 為士 枯神
年何人耶 亦常此 殊遇 有力 勸 椒 銷
是緣 而 而 以 嗣里 明 來 年 先 決 計 擬
既 亦 彼 在 部 責 前 乃 乃 乃 心 較 長 耶 之

設計與努力，將正聘可修增修或新
編籍外，並廣徵各科副教授，分列
力擔大學前赴百數十種，約無三百冊，於
三年內陸續徵集，即與此戰，先謀
充實機械，俾之有教之地，未暇以意
武之矣，孤軍奮討，志已初步達步。

願望；而今來連續努力，則明年或
那時，當能建起負責之廠，以保之
資源，至少在相當時期，以措置於
今故居時，所與子曰：動以思之，而
以少年時，其金幣之加重，亦係此因
求之而為之，以故也；更宜以峻拒，是

翻然改圖，一循古法，徵通例，多列與
 為甚，凡其所約，在馴，順推其有，自時和
 與商，定體例，以所約字為單母，十萬字
 為複母，十萬萬字為特母，字每頁多者
 以多為小，少者為多。至其約，必以廣文庫，
 年立為最，其詳定，嘉慶、宣統、壬子、壬寅

際之受其安焉；且藉其結習已
永其無忘也。世中拙陋友志其心
以之造福於廣大談者，取而廣為
與利之業，既得而三方並利，上世安有
至利主疏之者，則由訴曰：世相空陳，明達
王前，而尚持士信之。其福為：一、有，自

初者加標稿於約書末而之。如迄今已
 改稿者及世稿。預計今年七月合同
 時出版。乃於世稿。之後逐月均有新化
 一。此一標稿而斷。如以明日。不難漸臻百
 種式。如乃稿。不其甚歟！

中華民國六年春首月王雲五識

午午庫時承政研同學外

之

學古考亦助以吾志

加入古如耳中之一為本

上庫增光不少評政其

之海意

平石何然

編者弁言

本（六十六）年七月十六日（舊曆六月初一）欣逢吾師岫廬先生九秩壽誕，岫廬先生的門生故舊爲表示崇德報恩的敬意，研商如何安排一項有意義的祝壽活動。當岫廬先生八秩晉八華誕時，曾由其門生故舊及社會人士分別撰寫文章，合編而成「我所認識的王雲五先生」一書，表示對岫廬先生的感佩與仰慕。今年恭逢岫廬先生九秩嵩壽，應該有一項意義同樣重大而範圍更爲廣泛又能傳之久遠的祝壽活動，於是乃發起編輯「岫廬文庫」，因爲岫廬先生的門生故舊多半從事教育文化工作，他們缺乏財力來爲岫廬先生作盛大鋪張的祝壽節目，而生性淡泊的岫廬先生恐怕也不會同意那些鋪張浪費的節目。以文爲壽，乃是中外學者共有的傳統，因此，我們與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張連生先生商量，由岫廬先生的門生故舊及社會人士撰稿，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岫廬文庫」，以「岫廬文庫」爲岫廬先生壽。「岫廬文庫」的出版，不是空言對岫廬先生的歌頌，而是每一位著者以他的筆耕成果，恭恭敬敬奉獻給他們所敬愛的長者——虔誠地爲九十高齡的岫廬先生祝福！

岫廬先生是位蜚譽國內外的學者，幾十年來，在政治、教育、文化、社會工作

各方面的成就和貢獻是了不起的，也是有目共睹的，岫廬先生的苦學成功，早已成爲年輕人努力奮鬥的楷模，成爲老師們訓勉學生努力效法的榜樣，岫廬先生實在是當代中國對國家社會極有貢獻而且有深遠影響的偉人。「岫廬文庫」的著者們以岫廬先生爲榮，他們把筆耕的成果呈獻給岫廬先生，乃是表示他們願意效法岫廬先生的精神——個人的努力是爲了國家社會的利益，他們的著作希望能爲當前中國的學術文化界盡到一份知識分子的心力。

「岫廬文庫」要從岫廬先生九秩壽誕吉日開始長期出版下去，嗣後每月有新書出版，種類與冊數視實際情形而定。在內容而言，以人文與社會科學爲主，但其他方面如果有富有價值的作品，也將酌情納入。爲了攜帶方便，「岫廬文庫」採用四十開本印刷，每冊字數以五萬至十五萬字爲原則，以出版新著爲主，古籍舊書不予納入。

在岫廬先生九秩華誕的前夕，我們虔誠地祝福他老人家永遠健康愉快，同時也向對國家社會具有多方面貢獻的岫廬先生謹致最高的敬意！

陳水逢

謹識

王壽南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六月

前言

十六世紀中期以來，中西接觸之起源、過程，與相互之影響每爲中國近代史討論之主題，舉凡近代中國歷史上任何一件大事，莫不直接或間接與西方國家有關。這些事件姑不論其以戰爭、商業、外交或傳教之方式表現，究其本質，實爲二種不同文化接觸衝擊時所產生之現象。

論及近代中西文化之接觸，一般史家看法均大致相同，將其過程分爲二個階段，前者始自明萬曆初而至乾隆中期結束，後者自鴉片戰爭以至於今日。由於後者與今日中國之現況關係較爲直接密切且影響尤爲深遠，故治近代史之學者多半注重此時期之研究，且有豐碩之成果。相形之下，使得明清之際中西文化接觸之研究顯得較爲冷僻。而且，研究本期中西文化交流之學者，又多偏重於西學之東漸，至於中學之西漸，則多爲一些單元性之論著，雖其內容及見解亦頗有精闢獨到之處，但由

這些零散的著作中不易看出整個中學西漸之全貌。以上僅是就中國史家之研究而言，若再由西方學者研究漢學史之角度觀之，其研究重點又多置於十九世紀法國漢學研究及二十世紀歐美各國漢學之興盛。而於十九世紀以前之歐洲漢學每置於次要之地位僅作重點式的概述。實則爲瞭解十九世紀以來歐美研究漢學方法之形成及其趨向，亦必須對十六至十八世紀西方漢學有所體認。

固然，中外學者均不否認十六至十八世紀歐洲來華天主教士對中國之報導與研究爲近代歐洲漢學研究之先驅，但至少在我國，關於研究教士漢學之著作尙不多見，故今以此爲題，從事研究，應仍是具有其價值的。

造成不同文化接觸之起因甚多，或爲武力之征服、或爲商業之需求、或爲自然因素所造成之民族遷徙、或因地緣之接近而彼此來往。然十六世紀中葉中西接觸的基本因素除商業之需求外，僅就歐洲天主教教士來華傳教一事觀之，却具有相當的特殊性，當時教士本身並不具有商業或政治興趣亦無直接的軍事或經濟力量做後盾，彼等之來華並非出於被動或其他自然的因素，而是有意志的主動前來。雖然在傳教事業背後有殖民政策爲其推動力，但中國當時並非列強之殖民對象，亦並不渴求西

方文化。故從雙方接觸的原因觀之，實不同於已往因國家戰爭，民間貿易或其他自然因素而形成之接觸，而係出之於傳教士主動追求。

再論不同文化接觸之方式，或爲征服者強迫被征服者接受，或爲雙方在長期接觸下不自覺的彼此同化，或爲一方主動接受模仿另一方之文化。但十六世紀之中國，既非列強之殖民地，故歐人無法像在世界其他地區一樣強行推銷其本國文化，中西雙方相距甚遠，有著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西人驟從海上來，雙方亦不可能在短期內彼此同化。西方國家在新航路發現後，國勢如旭日初升，意氣飛揚，而中國一向自認爲天朝上國，在文化上亦有其優越感，因此雙方亦無主動地接受對方文化之可能。歐洲天主教教士於此時期來華，其目的固在傳播西方文化之精髓——天主教，然彼等來華之前，已略知中國文化之高深，（註一）了解中國人不可能輕易接受一種外來宗教，故他們本身雖志在維護及傳播正統之西方文化，然亦須深謀遠慮地尋求妥善的傳教方法，利瑪竇等人有計劃地適應中國文化，正是要雙方不起嚴重衝突之情況下，使中國接受來自西方的宗教信仰——或至少是一個「中化」了的天主教信仰，由於當時天主教教士來華之動機及使命的特殊，故耶穌會士宗教與文化的傳播